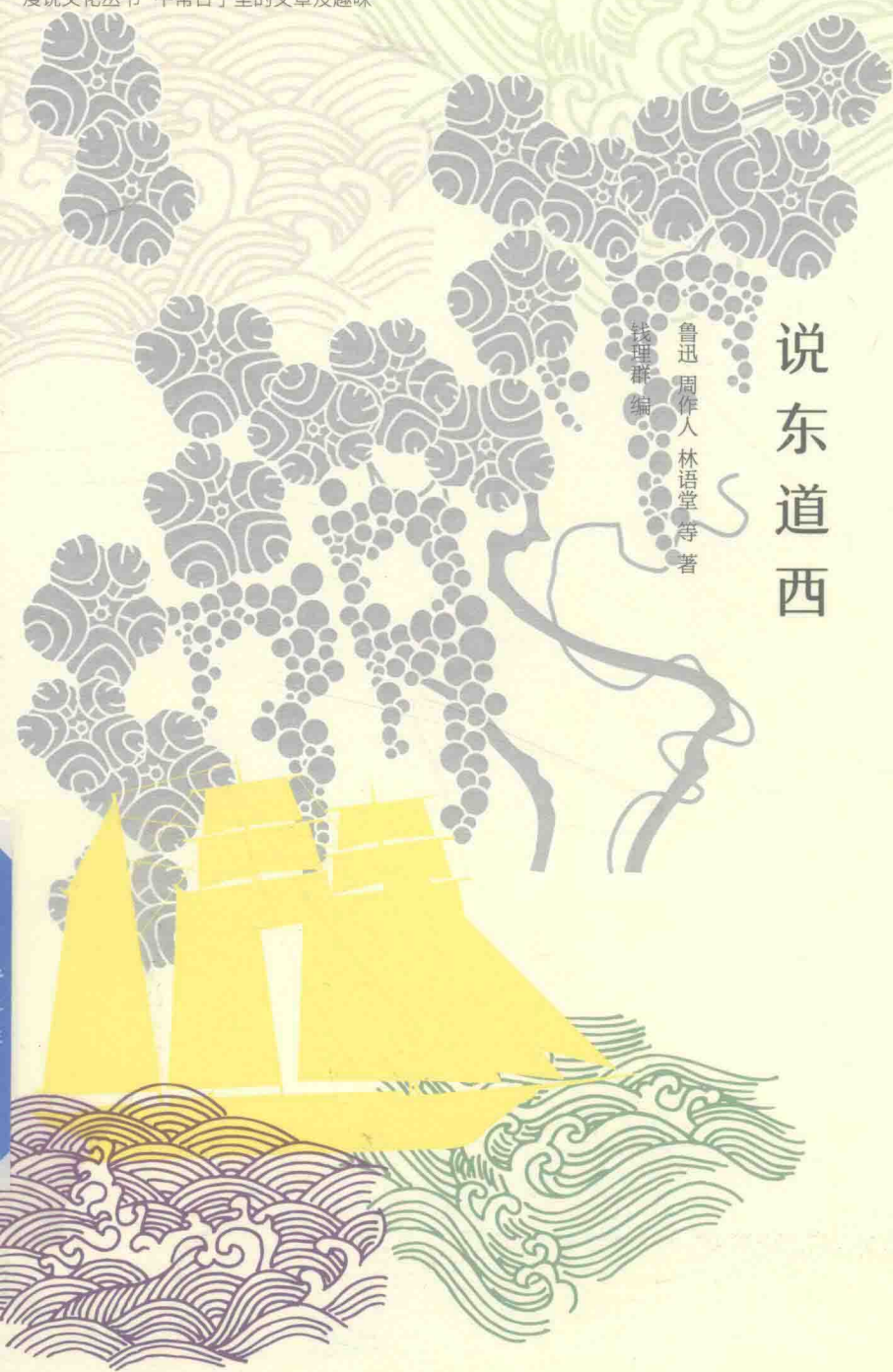


漫说文化丛书 平常日子里的文章及趣味

说东道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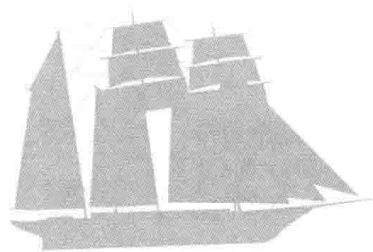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 周作人 林语堂 等著
钱理群 编



说东道西

鲁迅 周作人 林语堂 等著

钱理群 编



53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说东道西 / 钱理群编. —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
2018. 5

ISBN 978-7-5699-2346-9

I. ①说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现代②
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0826号

说东道西

SHUODONGDAOXI

编者 | 钱理群

著者 | 鲁迅 周作人 林语堂 等

出版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领读文化

责任编辑 | 孟繁强

装帧设计 | 领读文化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刷 |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| 6.75 字数 | 129千字

版次 |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|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| ISBN 978-7-5699-2346-9

定价 | 4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想 象 之 外 · 品 质 文 字



北京领读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| 再 记 |

转眼间，十三年过去了。眼看复旦大学版“漫说文化丛书”售罄，“领读文化”的康君再三怂恿，希望重刊这套很有意义的小书。

只要版权问题能解决（此次重刊，删去个别版权无法落实的），让旧书重新焕发青春，何乐而不为？更何况，康君建议请专业人士朗读录音，转化为二维码，随书付印，方便通勤路上或厨房里忙碌的诸君随时倾听。

某种意义上，科技正在改变国人的阅读习惯，一个明显的例子，便是“听书”成了时尚。对于传统中国文人来说，这或许是一种新的挑战。可对于现代中国散文来说，却是歪打正着。因为，无论是胡适的“国语的文学，文学的国语”，还是周作人的“有雅致的白话

文”，抑或叶圣陶的主张“作文”如“写话”，都是强调文字与声音的紧密联系。

不仅看起来满纸繁花，意蕴宏深，而且既“上口”，又“入耳”，兼及声调和神气，这样的好文章，在“漫说文化丛书”中比比皆是。

如此说来，“旧酒”与“新瓶”之间的碰撞与对话，很可能产生绝妙的奇幻效果。

2018年3月2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| 序 |

陈平原

据说，分专题编散文集我们是始作俑者，而且这一思路目前颇为读者接受，这才真叫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当初编这套丛书时，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趣味，能否畅销是出版社的事，我们不管。并非故示清高或推卸责任，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纯属“玩票”，不靠它赚名声，也不靠它发财。说来好玩，最初的设想只是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、装帧好看的小书，可以送朋友，也可以搁在书架上。如今书出得很多，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，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时欣赏把玩的却极少。好文章难得，不敢说“野无遗贤”，也不敢说入选者皆“字字珠玑”，只能说我们选得相当认真，也大致体现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某些想法。“选家”之事，说难就难，说易就易，这点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记得那是1988年春天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林语堂散文集。此前我写过几篇关于林氏的研究文章，编起来很容易，可就是没兴致。偶然说起我们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看法，以及分专题编一套小书的设想，没想到出版社很欣赏。这样，1988年暑假，钱理群、黄子平和我三人，又重新合作，大热天闷在老钱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，先拟定体例，划分专题，再分头选文；读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文章，当即“奇文共欣赏”；不过也淘汰了大批徒有虚名的“名作”。开始以为遍地黄金，捡不胜捡；可沙里淘金一番，才知道好文章实在并不多，每个专题才选了那么几万字，根本不够原定的字数。开学以后又泡图书馆，又翻旧期刊，到1989年春天才初步编好。接着就是撰写各书的前言，不想随意敷衍几句，希望能体现我们的趣味和追求，而这又是颇费斟酌的事。一开始是“玩票”，越做越认真，变成撰写20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。只是因为突然的变故，这套小书的诞生小有周折。

对于我们三人来说，这迟到的礼物，最大的意义是纪念当初那愉快的学术对话。就为了编这几本小书，居然“大动干戈”，脸红耳赤了好几回，实在不够洒脱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有点好笑。总有人问，你们三个弄了大半天，就编了这几本小书，值得吗？我也说

不清。似乎做学问有时也得讲兴致，不能老是计算“成本”和“利润”。惟一有点遗憾的是，书出得不如以前想象的那么好看。

这套小书最表面的特征是选文广泛和突出文化意味，而其根本则是我们对“散文”的独特理解。从章太炎、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祺、贾平凹，这自然是与我们提出的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概念密切相关。之所以选入部分清末民初半文半白甚至纯粹文言的文章，目的是借此凸现20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的联系。鲁迅说五四文学发展中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（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），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稳中求变，守旧出新，更多得到传统文学的滋养。周作人突出明末公安派文学与新文学的精神联系（《杂拌儿跋》和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），反对将五四文学视为欧美文学的移植，这点很有见地。但如以散文为例，单讲输入的速写（Sketch）、随笔（Essay）和“阜利通”（Feuilleton）固然不够，再搭上明末小品的影响也还不够；魏晋的清谈，唐末的杂文，宋人的语录，还有唐宋八大家乃至“桐城谬种选学妖孽”，都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散文中产生过遥远而深沉的回音。

面对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文体，学者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。五四时输出“美文”的概念，目的是想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好文章。可“美文”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能写景和抒情；虽然由于鲁迅杂

文的成就，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短文，也被划入散文的范围，却总归不是嫡系。世人心目中的散文，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加上悲欢离合，还有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比喻和形容词，甜得发腻，或者借用徐志摩的话：“浓得化不开”。至于学者式重知识重趣味的疏淡的闲话，有点苦涩，有点清幽，虽不大容易为入世未深的青年所欣赏，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。不只是逃避过分华丽的辞藻，也不只是落笔时的自然大方，这种雅致与潇洒，更多的是一种心态、一种学养，一种无以名之但确能体会到的“文化味”。比起小说、诗歌、戏剧来，散文更讲浑然天成，更难造假与敷衍，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、悟性与意趣——因其“技术性”不强，很容易写，但很难写好，这是一种“看似容易成却难”的文体。

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，一方面是让读者体会到“文化”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，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，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，一种心态，一种习俗，一种生活方式；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。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写景”也不怎么“抒情”的“闲话”，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认为准确的“散文”定义更有价值。

当然，这只是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种读法，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眼光另外的读法。在很多场合，沉默本身比开口更有力量，空白也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淘汰了不少名家

名作，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和愤怒。无意故作惊人之语，只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眼光和趣味，再加上“漫说文化”这一特殊视角。不敢保证好文章都能入选，只是入选者必须是好文章，因为这毕竟不是以艺术成就高低为惟一取舍标准的散文选。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有个性有锋芒因而也就可能有偏见的“漫说文化”。

1992年9月8日于北大

扫一扫，
收听有声版



| 附 记 |

旧书重刊，是大好事，起码证明自己当初的努力不算太失败。十五年后翩然归来，依照惯例，总该有点交代。可这“新版序言”，起了好几回头，全都落荒而逃。原因是，写来写去，总摆脱不了十二年前那则旧文的影子。

因为突然的情事变故，这套书的出版略有耽搁——前五本刊行于1990年，后五本两年后方才面世。以当年的情势，这套无关家国兴亡的“闲书”，没有胎死腹中，已属万幸。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，这十册小书出版后，竟大获好评，获得首届（1992）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选题一等奖。我还因此应邀撰写了这则刊登在1992年11月18日《北京日报》上的《漫说“漫说文化”》。

此文日后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版《漫说文化》(1997)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·漫说文化》(2004),流传甚广。与其翻来覆去,车轱辘般说那么几句老话,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引入这则旧文,再略加补正。

丛书出版后,记得有若干书评,多在叫好的同时,借题发挥。这其实是好事,编者虽自有主张,但文章俱在,读者尽可自由驰骋。一套书,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,让其体悟到“另一种散文”的魅力,或者关注“日常”与“细节”,落实“生活的艺术”,作为编者,我们于愿足矣。

这其中,惟一让我们很不高兴的是,香港勤+缘出版社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购得该丛书版权,然后大加删改,弄得面目全非,惨不忍睹。刚出了一册《男男女女》,就被我们坚决制止了。说来好笑,虽然只是编的书,也都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,不希望被人肆意糟蹋。

也正因此,每当有出版社表示希望重刊这套丛书时,我们的要求很简单:保持原貌。因为,这代表了我们那个时候的眼光与趣味,从一个侧面凸现了神采飞扬的八十年代,其优长与局限具有某种“史”的意义。很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,除了体谅我们维护原书完整性的苦心,还答应帮助解除人文版印刷不够精美的遗憾。

2005年4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| 导 读 |

钱理群

自从中国大门打开以后，我们就开始说“东”道“西”。

而且不停地“说”——从上世纪中叶“说”到现在，恐怕还要继续“说”下去，差不多成了“世纪性”甚至“超世纪性”的话题。

而且众“说”纷纭。你“说”过来我“道”过去，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不曾就这个“永远的热门”发表过高见，与此相关的著作不说“汗牛充栋”，大概也难以计数；至于普通老百姓在茶余饭后乘兴发表的妙论，更是随处可见，可惜无人记载，也就流传不下来。

流传下来的，有体系严密的宏文伟论，也有兴之所至的随感。尽管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眼光，但因为是毫不经意之中“侃”出来的，

也就更见“真性情”，或者说，更能显出讲话人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）在说“东”道“西”之时的心态、风貌与气度。这，也正是我们的兴趣所在；与其关心“说什么”，还不如关心“以怎样的姿态”去说——这也许更是一种“文学”的观照吧。

以此种态度去读本集中的文章，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以“世界民”自居的全球意识，由此而产生的恢宏的眼光，人类爱的博大情怀。周作人写过一篇题为《结缘豆》的文章，说他喜欢佛教里“缘”这个字，“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”，“却更带一点儿诗意”；在某种意义上，所谓“全球意识”，就是对自我（以及本民族）与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（以及其他民族）之间所存在的“缘分”的发现，这种“发现”是真正富有诗意的。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周作人所写的《缘日》、《关于雷公》、《日本的衣食住》等文，就不难体会到，他们那一代人从民俗的比较、研究中，发现了中国人、中国文化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人、日本文化内在的相通与相异时，曾经产生过怎样的由衷的喜悦，那自然流露的会心的微笑，是十分感人的。而在另外一些作家例如鲁迅那里，他从“中国（中国人）”与“世界（世界民）”关系中发现的是“中国（中国人）”“国粹”太多（也即历史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），“太特别，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，挣得地位”，从而产生了“中国（中国人）”如不事变革，便“要从‘世界人’中挤出”的“大恐惧”（《随感录·三十六》），这种成为“世界（人类）孤儿”的孤独感与危机感，同样是感人的。而拥有这种

自觉的民族“孤独感”的，又仅仅是鲁迅这样的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，在当时，民族的大多数仍沉溺于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”的迷狂，先驱者就愈加陷入孤独寂寞的大泽之中，如周作人所说，这是“在人群中”所感到的“不可堪的寂寞”，真“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，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”。我们前面所说与世界人“结缘”的喜悦里其实是内含着淡淡的、难以言传的哀愁与孤寂之苦的。我们说“人类意识”的“博大情怀”，原是指一种相当丰富、复杂的感情世界：人类爱与人类忧患总是互相纠结为一体，这其间具有深厚度的“诗意”，是需要我们细心体味，切切不可简单化的。

同样引人注目的是，前辈人在说“东”道“西”时所显示的平等、独立意识。如鲁迅所说，这原本也是中国的“国粹”；遥想汉唐人“多少闷放”，“魄力究竟雄大”，“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”，“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，就如将彼俘来一样，自由驱使，绝不介怀”，只有到了近代，封建制度“衰弊陵夷之际”，这才神经衰弱过敏起来，“每遇外国东西，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，推拒，惶恐，退缩，逃避，抖成一团”了（《看镜有感》），鲁迅在二、三十年代一再地大声疾呼，要恢复与建立“民族自信心”，这是抓住了“要害”的。读者如果有兴趣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林语堂的《中国文化之精神》与《傅雷家书》的选录，自不难发现，其中的“自信”，作者的立足点是：在“人类文化”的发展面前，各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，他们各自的独立“个性”